

# 唐代西南地区地方长吏对少数民族的安抚

左向阳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西南地区山川险峻,物产丰饶,经济、政治、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有唐一代,西南地区所面临的形势是较严峻的,外有强邻吐蕃南诏,内部民族种族众多,但整个唐代,西南地区社会基本和平稳定,经济一直向前发展,尤其是巴蜀地区,被称为唐之“外府”。其中原因之一,缘是西南地区地方长吏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安抚少数民族,营造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唐代 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 地方长吏 安抚

唐太宗主张对各个民族“爱之如一”<sup>[1]</sup>,提出“胡越一家”——各民族和睦相处,这两点成为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唐众多地方官吏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地方长吏在此方面堪称代表,许多节度使、州刺史都兼安抚使招抚使等职,他们都非常重视安抚蛮夷,安置移民,营造安定团结局面。

从唐王朝甫建,西南地方长吏就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初,隋末蛮酋爨反,诛。……

帝即位,以□子弘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益州刺史段纶因遣使招渝其部落,皆来降。”<sup>[2]</sup>武德中,韦云起“寻代赵郡王孝恭为夔州刺史,转遂州都督,怀柔夷獠,咸得众心。”<sup>[3]</sup>《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七年条:“唐兴……(韦)仁寿时为嵩州都督府长史,上闻其命,俞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嵩,使之岁一至其地慰抚之。仁寿性宽厚,有识度,既受命,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来见仁寿。仁寿承制置七州、十五县,各以其豪帅为刺史、县令,法令清肃,蛮、夷悦服。”“……及将归,蛮夷父老各挥泪相送。”<sup>[4]</sup>他们开拓了唐王朝的疆土,巩固了西南边疆的安定,对新兴王朝的巩固有重大作用。

中唐以后,唐朝同吐蕃、南诏关系恶化,西南边疆形势一度吃紧,韦皋在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兼益州长史期间,更是把这一问题同西南边疆战略局势结束,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佐时至蛮国羊咩咩城,其王异牟寻忻然接遇,请绝吐蕃,遣使朝贡。其年,遣东蛮鬼主骠傍、苴梦冲、苴乌等相率入朝。南蛮自嵩州陷没,臣属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至是复通。”贞元九年大破吐蕃后,“皋又招抚西山羌女、词陵、白狗、通租、弱水、南王等八国酋长,入贡阙廷。”<sup>[5]</sup>《新唐书》卷222《南蛮下》:“贞元九年七月,(东女国)其王汤立悉与哥隣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速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囊、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部落诣剑南西川内附。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其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万余户,相继内附。其粘信部落主董梦葱,龙诺部落主董辟忽,皆授试卫尉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会讫,锡以金帛,各遣还。寻诏加韦皋统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会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抚诸蛮,苴乌星、虎望等归化,微闻牟寻之意,因令蛮寓书于牟寻,且招怀之,时贞元四年也。……七年,又遣间使持书喻之。……九年四月,牟寻乃与酋长定计遣使,赵莫罗眉

由两川,杨大和坚由黔中,或由安南。使凡三辈,致书与韦皋,各贡生金丹砂为贄。十二年,韦皋于雅州会野路招收得投降蛮首领高万唐等六十九人,户约七千……”。“贞元中,嘉州绥山县婆笼川生獠首领甫积兄弟诱生蛮为乱,剽居人,西川节度使韦皋斩之,招其首领勇于等出降。或请增栅东凌界以守,皋不从,曰:‘无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自是不扰境。”<sup>[6]</sup>韦皋积极主动的招抚边陲少数民族,并妥善安置,保障内附民族生活,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吸引越来越多的夷族内附,削弱了南诏、吐蕃的实力,增强了唐朝的力量。他和南诏,拒吐蕃之所以取得卓越成绩,其正确的民族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许多官员在安抚少数民族方面采取了妥善措施,收到比较好效果。“李叔明,字晋卿,阆州新政人。本姓鲜于氏,代为豪族。……除右庶子,出为邛州刺史。寻拜东川节度遂州刺史,后移镇梓州,检校户部尚书。时东川兵荒之后,凋残颇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抚毗庶,夷落获安。”<sup>[7]</sup>大历三年(768),鲜于叔明就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值崔旰与郭英义、张献诚大战之后,人口锐减,百姓生活困苦,社会动荡不安,他招抚百姓,安定各族,稳定了社会局面,自然也促进了生产发展。由于政绩卓著,代宗赐予他皇族李姓。<sup>[8]</sup>“陈孝阳为嵩州刺史二十余年,蛮夷爱之,后以老归成都,蛮夷交持之,泣涕数百里方免。”<sup>[9]</sup>刺一州长达二十年,可知朝廷之信任,蛮夷交持啼泣,足见各族百姓之爱戴。这足以说明陈孝阳维护民族团结的卓越成就。汉唐期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多处于部落阶段,并无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求生活安定,衣暖食足,只有在基本生活条件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才会铤而走险,或盗或叛。许多地方长吏面临动荡,正确分析了局势,采取积极措施,消除了社会动乱。大历初,于邵任巴州刺史,“时岁俭,夷獠数千相聚山泽,围州掠众,邵励州兵以拒之。旬有三日,遣使说谕,盗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盗罗拜面降,围解。”<sup>[10]</sup>“夷獠”主要因为“岁俭”,生计无着,不得已劫掠求生。看来于邵正确分析了形势,并给了饥民一定的生活保障,从而招降了他们,平息了动乱。元和间,武元衡治剑南西川,“抚蛮夷,约束明具,不辄生事。”<sup>[11]</sup>长庆元年至长庆三年段文昌首任剑南西川节度,“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宽政为治,严静有断,蛮夷畏服。”<sup>[12]</sup>“长庆二年黔中蛮叛,观察使崔元略以闻,文昌使一介开晓,蛮即引还,彭濮蛮大酋蹉禄来请立石刊誓,脩贡献。”<sup>[13]</sup>贞元十四年至元和十年,李夷简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间,“嵩州刺史王颙积奸赃,属蛮怒,畔去。夷简逐颙,占檄谕祸福,蛮落复平。”<sup>[14]</sup>贞元十七年至二十年,谏议大(转31页)

### 三、小皮特推行英爱合并的借口

1783年12月,乔治三世任命小威廉·皮特组阁出任首相。小皮特是托利党的领袖属于少壮派。他两次担任首相(1783~1801年、1804~1806年)长达21年之久。从他以后,托利党一直执政到1830年。

在小皮特看来,合并是帝国的当务之急。1798年爱尔兰的叛乱是一个教训,叛乱分子曾经得到法国的援助,这种情况可能再度发生。他说:“爱尔兰好比一条着火的船,要么把火扑灭,要么把缆绳砍断,让它飘走。”<sup>[4]</sup>小皮特坚持为爱尔兰立法,认为这不是来自一些“失误的意图,但是来自爱尔兰议会本身,没有能力维持爱尔兰社会的发展”。皮特说,这个国家的状况是可悲的。租金被党派抽走,各个部分被分裂,遭受复兴的敌意,祈求遗传古老的爱尔兰和英国殖民的仇恨,对信仰和不断的偏见,真正的毒药济入者是雅各宾主义。这个国家状况的改变是渐进的、沉重的不带偏见的提高和文明化。救济的方法如通过资本流通,伴随贸易和商业的自然交流,显著的自由意识,清除派系分裂,压制冲突协会,和调整遗产资金维持依靠同样的土地生活两个国家。

小皮特坚持保留(burkean)伯克式的位置。小皮特坚持声称:1798年起义的推动力是“邪恶的雅各宾派”,不是天主教徒。<sup>[5]</sup>雅各宾主义是起义的导火索,同时我不否认那些参与者中牧师的作用,而他们主要是染上了雅各宾主义。皮特的言行似乎符合逻辑,他明明知道英爱之间的矛盾,却在极力掩盖起义的真相,只是为了达到合并的意图。

卡斯而雷(castlereagh)在维也纳(vienna)的和平谈判期间,他从路易十八(XV)的协议中抽出:“法国军队不会再答应爱尔兰组织。一个爱尔兰逻辑学家解释1798年危机为“最近的,部分的和短暂的。不管怎样,危险已经过去“海是清的,法国屈服和起义粉碎。”<sup>[6]</sup>小皮特没有发表意见,他继续推行合并策略中伯克式考虑,他希望看到两个国家利益的汇聚以至于人们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不能说话,除非他说作为真正的爱尔兰人,也不是他说作为真正的爱尔兰人,除非他说作真正的英国人。<sup>[7]</sup>即使周围所有的意见表明法国不再对英国构成威胁,皮特的意见一直保持不变,“雅各宾主义”真正地变成了他推动英爱合并的一个借口。

### 三、合并的结果

1799年1月23日,小皮特提出并在下院以236对50票的多数通过了英爱合并的提案。该案不管爱尔兰人民反抗,

于1800年由英爱总督康华理斯和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斯托拉里主持强行在爱尔兰议会通过,赞成票158票,反对票118票。在这个过程中,小皮特内阁使用了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1801年1月1日合并法案正式生效,爱尔兰议会取消。这就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痕迹,巩固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1800年9月5日,卡斯托里拟就合并法案,在帝国议会里,爱尔兰将派一百名代表参加下院,三十二名贵族参加上院。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教会实行合并,爱尔兰的英国国教组织则维持原状。联合议会的全体成员都要履行排斥天主教徒的宣誓,但是将保留天主教徒在1793年重新获得的以四十先令纯收入的财产资格在各郡和选邑参加选举的权利。

1801年初,当合并已经稳妥之后,皮特代表内阁,建议英王把允许天主教徒参加议会、免除就职宣誓、给天主教主教和教士颁发国家资薪和选举规则等等,列为合并法案的部分内容。此时,乔治四世认为同意天主教徒会破坏他的加冕宣誓。1801年1月22日,小皮特的主张在联合会议上以245对63的多数得到支持。六天后,国王召见敦达斯,就天主教教徒解放一事发表谕旨:“我将把提出这类措施的一切人视为我的私敌”。天主教徒解放是我所知道的最雅各宾式的事情。”国王又派阿丁顿至小皮特处,要求废止天主教徒解放的措施。英爱之间的民族矛盾更加激烈了,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断高涨。

格莱斯顿说:只有当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政党目的有用的时候,它才能为英国政治家们所重视。因为爱尔兰扼制英国的咽喉,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参考文献:

- [1][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M].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
  - [2][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 [3]Paul Bew,Ire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 [4]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林举岱.世界近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6]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 [7]William.Pitt,The speeche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William Pitt in the House of commons,London,1817.
- 作者简介:王银红,女,26岁,湖北人。福建师范大学2007级世界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洲文化史。

(接39页)夫裴佖出为以谏议大夫裴诘为黔中观察使,前任韦士宗“惨酷驭下,为夷獠所逐,俾诘代之,酋渠自化。”<sup>[15]</sup>戎、泸间有葛獠,“大中末,昌、泸二州刺史贪沓,……(獠)遂叛,立酋长始艾为王,逾梓潼,所过焚剽,刺史刘成师降其党,斩首领七十余人。余众遁至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谕降之。”<sup>[16]</sup>

总体来说,唐代西南地区地方长吏在多民族的社会环境中,执行了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维护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有利于边疆安全,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 参考文献:

-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6247页。
- [2]《资治通鉴》卷188高祖武德三年条。5876页。
- [3](晋)刘昫《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2633页。

- [4]《旧唐书》卷185上《韦仁寿传》。4782页。
  - [5]《旧唐书》卷140《韦皋传》。3822、3823页。
  - [6](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6327、6328页。
  - [7]《旧唐书》卷122《李叔明传》。3560页。
  - [8]《旧唐书》卷11《代宗纪》大历十二年八月条。312页。
  - [9](宋)李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683《牧守》
  - [10]《旧唐书》卷137《于邵传》3765页。
  - [11]《旧唐书》卷158《武元衡传》4160页。
  - [12]《旧唐书》卷167《段文昌传》。4368页。
  - [13]《新唐书》卷89《段文昌传》。3760页。
  - [14]《新唐书》卷131《李夷简传》。4506页。
  - [15]《旧唐书》卷98《裴佖传》3048页。
  - [16]《新唐书》卷222下《南平獠传》6325页。
- 作者简介:重庆市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级研究生。